

情感時代

——讀克蘭·布林頓《革命解剖學》

• 高毅

Crane Brinton: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克蘭·布林頓(Crane Brinton, 1898–1968)的名字，在西方學術界是叫得很響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寫過一本《革命解剖學》。這是一部關於世界近代史上發生在英國、北美、法國和俄國的四次革命的比較研究，初版於1932年，1952年修訂再版，1965年再次修訂增補出版。該書問世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暢銷不衰，風靡了整個歐美學壇。

布林頓是學歷史的，獲過哈佛的碩士(1919)，牛津的博士(1923)，畢業後一直任教於哈佛大學歷史系。他熱心於革命運動史的研究，尤其對法國大革命興趣濃厚，曾於1927–28年間在法國專門考察過雅各賓俱樂部的歷史，寫出

了《雅各賓派：新史學的探討》(1930)、《革命十年，1789–1799》(1934)和其他幾部論著，由此成為美國最早的法國革命史權威之一。但這還遠不是他漫長學術生涯的全部。實際上他學歷史的興趣還是從讀英國思想史開始的，後來也從未放棄過對思想文化領域的關注，先後發表過《英國浪漫派政治思想》(1926)、《觀念與人》(1950)、《西歐的氣質》(1953)、《近代思想的形成》(1953)等等膾炙人口的作品。可見，與其說布林頓是一位革命史專家，倒不如說他首先是一位思想文化史學者，或者說他是一身二任、兩家俱成。

對革命的「熱病論」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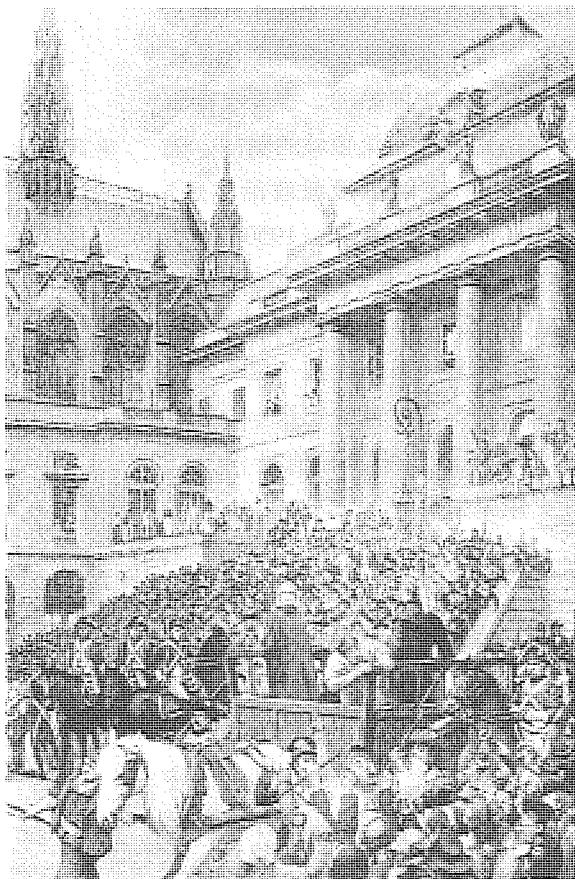
布林頓所研究的那四場革命，至少在外觀上有這樣一些共同特徵：都發生在後中世紀的西方世界，都號稱「人民的」或「民主的」革

革命頗似「熱病」，「科學地」認識革命的最好途徑，莫過於借用病理學上的熱病概念作為分析框架，參照人體熱病的一般規律來解讀社會革命的一般規律。

命，都以「多數人自由」的名義反對「少數人特權」，而且都很成功——即後來革命者都取得了政權。簡言之，這是一些典型的「民主革命」。事實上，這些革命的指導原則和行為方式直到今天還為形形色色的「革命者」所師承。

布林頓試圖用某種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解讀這種革命，以求「客觀地」揭示它的興衰規律。他發現，這幾次「近代型」或「民主型」的革命儘管發生在不同國度，但經歷的卻是一種大致相同的過程，即是：革命前夕會出現一些不易覺察的徵兆，革命初期有一段溫和派執政的短暫蜜月，其間日益增長的激進派勢力與保守的當權派時有較量，隨後便是激進派的迅速得勢並程度不一地導致道德與恐怖的統治，這種

民主型革命在其上升階段通常呈現着「激進化」趨勢。在初期掌權的溫和革命派注定要為激進革命派所取代。



統治強化到一定程度時又會引起「反彈」，革命進入反動階段——舊社會種種世象重新浮現，再經過幾度動盪，革命留下若干基本成果後悄然離去，秩序重歸正常。而這樣一套程式，又頗似「熱病」這一自然病理現象在人體中所經歷的全部過程——從前驅病狀出現，到全部症狀顯露，到忽好忽壞地一步步進入危象，發生譫妄，再到病情時有反覆的康復期，直至最後燒退病愈。有鑒於此，布林頓認為，「科學地」認識革命的最好途徑，莫過於借用病理學上的熱病概念作為分析框架，參照人體熱病的一般規律來解讀社會革命的一般規律。

把革命比作一種「熱病」，看起來是一種簡單的附會，其實這裏別有深意。按照布林頓的革命動力學理論，一場革命的發生與進行既有物質方面的原因，也有精神方面的原因，或者說既有經濟的因素，也有情感的因素。但兩相比較起來，布林頓似乎更重視「人的情感」這種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他對革命發展一般過程的剖析，儘管細緻入微、面面俱到，但重心始終坐落在情感的活動方面。在他的筆下，革命似乎就是一個「情感時代」，一個人類情感的力量得到充分展示的時期。當然，這反過來也就意味着人類基於經濟利益的現實理性思考在這個時期受到普遍的壓抑。社會正是在這種普遍的非理性狂熱中陷入「熱病」狀態，人們在這種狀態下的種種非常行為於是便有了解釋。由此看來，布林頓的「革命熱病論」強調的是革命現象中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性。

革命起因中的情感要素

關於革命熱病的前驅病狀，布林頓精扒細梳，列出了一個長長的清單：政府出現高額財政赤字，奉行不公正的經濟稅收政策，行政管理混亂，知識分子對現行秩序的忠誠發生轉移，統治階級分子大量喪失自信，社會對抗加劇，社會流動的某些渠道發生阻滯，經濟勢力同政治權力及社會榮譽出現脫節，等等，等等。所有這些情況都將導致也只能導致一個直接後果，這就是空前強烈的不滿情緒瀰漫於整個社會。

布林頓特別反對把革命的起因歸結為生活窮困的流行說法，認為這根本不符合四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他指出，這些國家革命前的社會經濟情況都並不很糟，如法國當時只是政府有財政困難，社會本身卻很富有；美國人也並未因印花稅法的頒行而餓肚子；英國革命前社會經濟更是一片昌盛；而1917年俄國的生產力水平之高也是空前的。儘管窮人的邊緣集團到處都存在，但在最初促成革命形勢出現方面，他們並不會起過甚麼重要作用。那麼，革命的主要起因究竟是甚麼呢？布林頓指出：同人民的貧困比較起來，「重要得多的，是某個集團或各個集團中存在的關於現存條件限制或阻礙了他們經濟活動的感覺」，如路易十六政府的稅收改革既得罪了特權集團又沒能討好非特權集團，都鐸王朝恢復舊稅法的企圖使英國商人感到了威脅等等。布林頓還特別指出這一事實，即革命

往往發生在生活標準普遍提高之後的蕭條期。

民主型革命最本質的起因也許就是業主集團經濟上的不滿情緒。然而單因這種不滿還不足以立即爆發革命。革命終究是需要有民衆參與的，因而業主集團要革命，首先還必須調動起民衆的情緒。其手段一般說來，便是通過政治宣傳，對自己在經濟上受到的束縛加以道義上的變形，即使之成為一種非正義的惡行，從而激發全社會的道德抗議。這製造輿論的工作自然離不開知識分子。因此，知識分子「忠誠轉移」的問題，便成了布林頓革命起因討論的又一個焦點。布林頓發現，每次革命之前夜，知識分子到處都在轉向反政府勢力一邊。知識分子本身就具有不滿現狀、富於社會批判意識的特徵，而社會愈是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多由政府的倒行逆施所致），猛烈攻擊現存制度的知識分子就會愈多，而這種革命知識分子愈多，社會上的革命情緒也會愈益高漲，就像人體的熱度會隨着白血球的增多而上升一樣。這當然也是由知識分子的某些性格特點——如不重實際、富於幻想，如恪守救世主義信條，總想把彼岸的道德天國搬向人間等等——所規定了的。總之一旦大批知識分子轉移了自己的忠誠，成了革命的吹鼓手，整個社會就很難冷靜下來了。

革命激進化的心理動因

民主型革命在其上升階段通常呈現着「激進化」趨勢。在初期掌權

布林頓特別反對把革命的起因歸結為生活窮困的流行說法，認為這根本不符合四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他指出，革命往往發生在生活標準普遍提高之後的蕭條期。

知識分子不重實際、富於幻想，恪守救世主義信條，總想把彼岸的道德天國搬向人間。一旦大批知識分子轉移了自己的忠誠，成了革命的吹鼓手，整個社會就很難冷靜下來了。

的溫和革命派注定要為他們以前的同路人——激進革命派所取代。那麼，個中奧秘何在呢？

布林頓分析道：溫和派自奪權伊始，便有了兩件頭痛事。首先是左右受敵，日形孤立；其次是無力組織一支能打仗的軍隊。而造成這些麻煩的原因，則是他們對「自由」價值的迷戀。由於誠信自由是革命的唯一宗旨，他們羞於一上台便取消自由，故而既不敢鎮壓左派激進勢力，又不願剝奪右派（即反革命派）的發言權。結果他們哪一邊都討不了好：不受扼制的反革命威脅迫使他們維持着「左」的姿態（說是「左邊無宿敵」），然而真正的左派卻因厭惡他們的右傾軟弱而不屑於與之聯手。同樣，對個人自由的極端尊重也決定了他們軍事上的無能，不可能指望這些迂闊的自由主義者能夠帶出一支軍紀嚴明、勇於殺敵的軍隊。激進派則不然。儘管他們也承認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自由，但他們卻不主張在革命的過程中便着手實行自由，認為這種過早的自由會使革命派喪失行動的效率，並給革命的敵人以陰謀復辟的可乘之機。因而他們在行動上處處表現出專制的作風：在自身內部強調集中制領導（往往演成個人獨裁），對社會則倡導「革命專政」——包括剝奪政見異己者的言論自由，或乾脆從肉體上消滅之。正是憑着這種專制作風，激進派才顯得比溫和派更利索，更能適應革命鬥爭的緊張時勢。

然而不管怎樣，「自由」與「專制」的聯姻終究有悖於常理，尤其是激進派往往喜歡強制推行一些違

背大多數人意願的政策措施，甚至不惜以「自由」的名義濫殺無辜。這說明激進派有一種不為常理所囿的實幹品性，一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里風格。不消說，敢於這樣做事的人總是離不開一定的信念基礎的，而支撐所有激進派的一個共同信念，便是他們以「人民的真正代表」自我確認，似乎天已降救世大任於斯人，他們為改善人類命運來進行統治，自然可以為所欲為。

這也就是說，激進派取代溫和派上台的奧秘，很大程度上便在於前者具有後者所沒有的政治狂熱。溫和派虧就虧在他們「溫而不熱」、過於理智，虧就虧在他們不懂得這樣一個道理：革命時代是一個不需要理智的情感時代，是一個不真實的、熱昏的時代，常識在這裏不起作用，審慎在這裏不啻愚蠢，寬厚穩健的賢者注定四處碰壁，唯有理想主義的狂人如魚得水。

布林頓還發現了這樣一個秘密：激進派對於溫和派的「情感優勢」，與激進派「人數少」有很大關係。近代各國革命中的激進派的確都是「極少數」。布爾什維克甚至公開自稱是「極少數然而代表人民的人」。這其實不難理解。革命時代熱鬧非凡，充斥着群眾現象，然而能夠長久保持革命激情的並不是群眾，而只能是少數激進派人物。群眾的特性之一就是極易於在情緒上接受煽動和操縱，故而少數激進分子可以通過狂熱的政治宣傳較長久地維持社會的革命熱情，同時發展自己的勢力，排斥溫和派影響。事實上，革命狂熱不僅較易於在由較

激進派取代溫和派上台的奧秘，很大程度上在於前者具有後者所沒有的政治狂熱。革命時代是一個不需要理智的情感時代。

少的人組成的小圈子裏長期維持，而且還會因這「精英少數」所特有的危機感和自豪感而不斷加碼。極少數人即由此得以號令天下矣。

道德理想的恐怖

隨着激進派的上台，革命熱病便進入「危象期」——恐怖統治階段。不過應該注意，布林頓所說的「恐怖統治」，並不一定就意味着血雨腥風，儘管大規模逮捕和處死嫌疑犯是法、俄革命恐怖時代的典型景象。就四國革命的一般情況而言，所謂恐怖統治，乃是同對反革命分子的財產沒收、對經濟活動的國家統制以及對社會公眾進行愛國主義和禁欲主義的道德控制聯繫在一起的。這種恐怖統治，實質上就是社會生活普遍政治化，用布林頓的話來說，便是「千百萬普通人的生活遭到原本不屬於他們的英雄關切的入侵」，以致於「每一個人，哪怕是最自私、最超凡脫俗的人，都無法不去關心政治」。說白了，這是一個人人都必須關心國家大事的時期，一個「破私立公」的時期。革命向私生活發起凶猛衝擊，力圖掃除舊習俗、樹立新風尚，令人人矢志報國而不謀私利，勤勞儉樸而不思享樂，成為清教徒式的愛國者。總之，革命在這時已經化作一種新式宗教，一種文化革命，它要求人盡舜堯，希望通過恐怖統治來畢其功於一役，實現人間天國的道德理想（布林頓形象地比喻道：這是在「強迫人們一口喝下一碗滾開的菜

湯」）。你敢不從命嗎？那你就是異教徒，就是公意的反對者，就是人民之敵或階級敵人，可以為人們隨意懲處：輕則塗瀝青黏羽毛遊街，重則財產充公、命喪斷頭台。

這種道德恐怖最大的歷史功績，似乎就在於它使人類領悟了讓狂熱理想主義者當權的危險。激進民主派多是這樣的理想主義者，恐怖統治則是他們異常衝動的理想情感的產物。理想主義者作為價值理性的持有人，的確是一個健康社會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他們的作用必須有個界限。在這方面，布林頓的見解是：理想主義是正常穩定社會的膠合劑，應當享有社會殊榮，但絕不可授以權責。這大約也正是許多西方國家的現實了。

現實理性之反彈——熱月

恐怖統治的危象既出，革命熱病的康復期也就為時不遠。康復者，回歸舊狀也，亦有「反動」之意。法國革命後期出現的熱月反動，應為這種康復期的典型形態（這無疑也是因了法國革命的恐怖統治最典型的緣故）。「熱月」一詞遂被布林頓順手拈來，作了指代各國革命高潮之後反動落潮時期的專門術語。

布林頓把「熱月」現象的主要特徵概括為三個方面：一，寬赦溫和派，鎮壓激進派；二，復活舊式宗教，清除革命崇拜；三，摒棄道德管制，重倡發財享樂。這三個特徵其實又可以簡括為一句話，即對前階段「文化革命」的徹底否定。在恐

這種恐怖統治，實質上就是社會生活普遍政治化，便是「千百萬普通人的生活遭到原本不屬於他們的英雄關切的入侵」。

理想主義者作為價值理性的持有人，的確是一個健康社會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他們的作用必須有個界限，絕不可授以權責。

「熱月」伊始，反動挾感情之威勢呼嘯而來，導致白色恐怖、道德淪喪。而過頭的反動又引發新的紅色恐怖和道德抗議，如此反覆震盪，直至情感耗盡，革命才能最終穩定下來。



怖統治下為情感所壓抑的現實理性終於開始了自己的「反彈」。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畢竟人們還是處在革命的年代，這種理性的反彈仍不免帶有感情用事的非理性特點。「熱月」伊始，反動挾感情之威勢呼嘯而來，很快就會走過頭，導致白色恐怖、道德淪喪。而過頭的反動又勢必引發新的紅色恐怖和道德抗議，如此反覆震盪，直至情感熱能耗盡，新的平衡出現，革命才能最終穩定下來。

但無論如何，「熱月」終究是一個理智復蘇、熱病痊愈的過程。布林頓比較了一下，發現美國革命的「熱月」最為簡單，或者說那裏並不存在完整形態的「熱月」，有的只是一些零星的類似迹象，如軍事訓練放鬆，戰爭氣氛消融，人們重新全力追求發財享樂等等。相反，俄國革命的「熱月」則顯得極為複雜而持久：它應該說自1921年新經濟政策頒行起就開始了，可是直到60年代

還沒有要結束的意思。危機與恐怖在此期間頻頻復發，儘管這些危機與恐怖愈來愈缺乏古典的理想主義情操，愈來愈像法國革命「熱月」時代的權力角逐。布林頓猜測：或許俄國正在經受其革命熱病後遺症的折磨，局面遲早還是要穩定下來的，其結果很可能是近約地回到十九世紀，重現一個向西方開放的社會。

俄國革命的後遺症為甚麼如此嚴重？布林頓不曾解釋。但答案似乎明擺着：因為俄國革命空前激進。事實上，俄國革命中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較之以往歷史上最激進的法國革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所以俄國革命需要以更狂熱的激情作動力，需要一再訴諸更極端的手段來維持。這樣，俄國革命中形成的政治文化也不免比法國革命的政治文化更顯得尚空談而不尚實際、尚鬥爭而不尚協和，從而為「熱月」康復預設下更加難以逾越的障礙。

理解革命

革命潮起潮落，熱病匆匆一場。悲乎？喜乎？

布林頓顯然是同情革命的。在他看來，儘管每一次革命都有「熱月」發生，甚至往往出現復辟，但這並不意味着革命徒勞無功。他不願粉飾四國革命的種種蠢行與暴行，但他仍認為它們不乏豐功偉績，如改善了國家的管理狀況，促成了財產權的適當轉移，擴大了政權基礎，更新了統治階級，以及弘揚了自由、平等、人權、無階級社會等一系列崇高信念，創造了影響深遠的革命民主主義傳統等等。布林頓發現，就像一個患過熱病的人往往會獲得某種免疫力一樣，一個發生過革命的國家往往顯得更有活力，會取得多種輝煌的文化成就。布林頓還特別指出：虛弱墮落的國家從來不會發生革命，能經得起革命乃是一個社會富於朝氣的表徵。

布林頓讚賞革命，還因為他看到革命是人類特有的「反壓迫情感」的自然而且不無合理的衝動。在該書主體部分的末尾，他意味深長地說道：「除非我們能夠像馬那樣蠢笨，或者說像馬那樣明智，這個世界才不會發生革命。」很顯然，人具有反抗壓迫的情感，這是人與馬之間最大的不同點之一。而任何革命，不管它後來變成了甚麼樣子，其最初的起因都只有一個，那就是壓迫。正是由於不甘心受壓迫，人們才頻頻揭竿而起。即使人類大同的道德理想，也不過是這種反壓迫情感的一種較高級的表現形式，儘

管這種道德理想的全面貫徹為時尚早，而訴諸恐怖手段强行實施更是愚不可及，然而它終究還是一種寶貴的價值，值得一代代仁人志士為之奮鬥不息。革命雖則是一種非理性的感情衝動，但卻也深刻體現着一種徹底的理性精神——對社會正義的追求。另一方面，當這種感情衝動超出另一層次理性亦即現實理性所能承受的程度時，就是說當現實社會不堪忍受恐怖統治的重負時，某種恰當的「熱月反動」也屬無可非議，因為它同樣也是反壓迫這種人類情感的產物。

由此看來，從「情感」因素切入，的確不失為認識革命的一條重要途徑。認識到人類的情感在革命過程中的關鍵作用，或可令革命之敵將心比心，有所醒悟；也或可令革命人士行有所止，減少盲動；還或可令旁觀者報以理解，調準立場，不至於再擺出教師爺的架子，指手劃腳，說三道四，一味地拿工具理性壓價值理性，結果傷了不應傷的感情。

布林頓顯然是同情革命的。他不願粉飾四國革命的種種蠢行與暴行，但他仍認為它們不乏豐功偉績。虛弱墮落的國家從來不會發生革命，能經得起革命乃是一個社會富於朝氣的表徵。

高毅 歷史學博士，現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任講師，著有〈丹東政治矛盾性再認識〉、〈熱月現象芻議〉、〈論法國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意義與方法〉等十多篇論文和專著《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並主持或參與翻譯過費正清、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革》、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內容》等多種譯著。